

逃离与归来:阎连科的空间构型与乡土梦寻

许 心 宏

(安徽财经大学 文传学院, 安徽 蚌埠 230030)

摘 要:在阎连科的后乡村叙事中,负载于“城市”与“乡村”女性意象的文化空间构型上,“城市”成为乡土文化的他者,“乡村”成为道德话语的本源。这体现在“农裔”知识分子、农民军人、进城民工与知青下乡的四个系列中。基于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与城乡社会发展的失衡,叙事者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演绎在道德问题上,继而形成了道德话语的城乡之争,内中体现的是叙事者农耕文化伦理的乡土根植。

关键词:逃离;返乡;空间结构;女性意象;家园梦寻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2)05—0047—06

当代文学史上,阎连科在其酷烈、魔幻、梦魇、荒诞的乡村叙事中,其遒劲奔涌的心力与笔力定格在苦难、生死、食色、病残、钱权、还乡等文化主题的重复性书写上。谈及创作心路时,作者说:“我写小说可能最重要的不仅仅是不重复别人,而是不重复自己。”^{[1](23)}然而,如是文心表白却也有待商榷。因为在城乡生存空间的游离与确认中,人物情节的“出走—归来”却成了文本深层结构的“重复”机制,这集中体现在“城市女”与“乡下女”空间化女性文化意象的分殊上。内中的“逃离土地”与“返身回家”体现出作者“血脉在乡村一侧”的文化心理扎根。就“重复”的接受美学而言,它旨在“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2](1)}基于此,在“乡村中国”转向“城市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与审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中,“不重复”的“重复”是其空间表述的农耕文化伦理寻根与乡土根植的家园梦寻。

一、“农裔”知识分子:逃离乡村与告别城市

身为女性,其生理性别有着先天的相同;但就社会性别与文化性别而言,却有着空间化的“城—乡”分别,继而伦理之维的“褒”与“贬”、“抑”与“扬”成为文化心理的结构在场。在空间化女性意象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差异的同时,显示了作者对“乡下女”伦理秉守的认同与敬畏。《风雅颂》中清燕大学教授杨科在城里妻子与乡下前女友玲珍之间,出身同类的珍珍之死加剧了他文化身份的救赎心理。杨科在“皇城”读书时与城里的赵如萍相爱,看似在跳出农家与抱得城市美人的双庆之余,乡村故里却有钟情于他的前女友玲珍。坐实在空间化的心理求解中,“城中”婚姻之“实”与“望乡”情爱之“虚”,却是“农裔”知识分子对城乡两类女人文化身份的认同与疏离。两者对杨科的爱有着格式化的差异,前者呈现着功利主义色彩的市民形象,后者呈现着残缺主义的地母形象。在空间化的文脉浸润中,城里妻子则外强中干,她爱时髦、崇虚荣、要面子,是官场情场通吃的蹿红教授,特别是不顾廉耻与大学副校长李光智偷情在杨科家中。如果说“士不知耻,乃国之大耻”,那么《风雅颂》无疑“是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

收稿日期:2012-08-30

作者简介:许心宏(1979—),男,安徽财经大学文传学院,文学博士,讲师,从事文艺学研究。

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3](327)}这主要体现在对集“钱权色”于一身的李校长人物意象的反讽上。在杨科“被精神病”住院期间,城里的妻子望杨科是假,离婚才是真。在李校长的权力重压与妻子出轨的婚恋失意下,继而跌入了“都市外乡人”的“农裔”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自卑与文化心理失重之中。杨科逃离“精神病院”后重返了乡土故里,然返乡后父母皆以告亡,还是玲珍给了他一处“惶栖”之所。在对杨科精神错乱般的“梦魇”叙事中,写他对玲珍女儿“想入非非”。这些带有“乱伦”意味心理书写的背后,无非是其心理补偿的想象性慰安,旨在言明城市婚姻的愤恨与失落。随着玲珍的死去,他逃离“皇城”后逃逸至黄河故道边的“诗经古国”中借以托身。细想起来,在空间化女性意象的隐喻中,作者的情感结构编码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从女权主义批判视角来说,玲珍对杨科的痴爱,蕴含的是对读书人的知识崇拜与道德宽宥,因为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士”的阶层稳居“四民之首”。藉此说来,文本中的“三角恋情”只是空间化文化心理结构的表象,内在根柢还是对乡下女人愧疚心理的再现,寓意的是对现代工商业城市的一种文化厌弃心理,也是作者对乡土情结根植的文化深情。

另还有大学生返乡。在电视小说《母亲是条河》中,阎连科深情刻画了乡下母亲与女友玲子的形象。^[4]宝军从在北京的著名学府读大学,到留学英伦攻读博士学位归来。这期间,宝军的城市恋情只是轻描淡写的或有或无,也正是在城乡空间蒙太奇的暗置中,作者安排了故乡的玲子未能高考中榜,但却也暂不嫁人,塑造了这一乡村守望者的女高中生形象。待至宝军学成归来,玲子的苦等似乎有着圆满的结局,然这对恋人能否喜结连理,小说的结尾却是开放性的。不过,宝军的母亲周翠却已将玲子视若自己的儿媳。其实,宝军并非周翠亲生但却待若己出,为了供养宝军读书,两个姐姐都已付出了一言难尽的血与泪的代价。因而,宝军的还乡有着丰富的思想与情感张力。不过,在多元的接受解读中,宝军的还乡,一个凸显的主题是当代士子情怀的文化心理救赎。其实,从小说创作本身来说,《母亲是条河》的开放性结尾设置,更多的是避开惯常结尾的重复;从婚姻现实上来说,则是现实“梯度”婚姻的难以结合。但不变的是,作者设置玲子未能跳出农家,且连续几次未考上,在作者创作心理的无意识中,使得玲子成为一个留守乡下的女人。在苦情的悲心中,玲子在等待,母亲在等待,村落里的人在等待,在“女人+村落+童年+等待”意象的交叠复合中,等来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宝军归来。宝军从“离乡”到“返乡”,在人生起点的往返之旅中,建构的是“故乡—母亲—童年—家园”文化空间意象的心理生成。应该说,阅读《母亲是条河》,就是阅读一种悲不自胜的心理疼痛,这种疼痛最终在乡间母亲的精神召唤中得以释怀。当然,从认知叙事学上来说,一个高学历的宝军能否舍弃国外乃至国内大都市的丰厚待遇,这不能不是一个疑问。但是,这种疑问,不排除现实中的个案,因而,在“叙事可靠性”与“不可靠性”的“擦边”中,作者“苦情大戏”的再度上演并不是叙事“可靠性”的“硬伤”,相反,倒是坚实反映了作者农耕文化心理一往情深的根植。

二、“和平军人”:参军进城与乡土梦寻

在“和平军人系列”小说中,“三角恋”的结构安排有着庸常的世俗,然这却不是作者的苦心与用心之所在。在“农民军人”情感天平的两端,城里女人惯常性作为否定的对象,乡下的女友则是肯定的对象。臧否之间,闪射的还是作者文化心理根植的深情与愧疚,这是作者的“情感狱”所在。在生存理性上,“农民军人”离乡参军旨在“逃离土地”继而改变生存处境,这既有作者自传式的文化心痕,又有城乡发展“失衡的中国”对农民改变自身处境艰难的哀叹。然“离乡者”从农村人到不再是农村人,在其离乡出走与故土回望中,文化心理的失重体现的是其文化身份的冲突。《和平战》中郁林其的发妻为市政府职员。然在作者书写的笔端,还是惯性描摹了城里妻子的自私、自利、虚荣,然这种镜像描摹还是表层的,最根本的还是隐性的心理否定意绪,这主要体现在“性爱”的心理密道中。在性事的洞若观火中,城里妻子“想到她身上趴着一个农民,她便没了一点性欲”^{[5](52)}。这里,城里妻子认为郁林其虽“趴在上”,但却傲视丈夫文化身份的“低在下”,“性战”中的农民军人败下阵来。从性的“自然”到性的“文化”,体现了农家出身的郁林其文化心理的自卑。与城里妻子虽生有女儿,但离婚后妻子却将女儿的姓由“郁”改为姓“吴”,“改名”喻示郁林其不过是“城市过客”,最终难以扎根城市。这其中,从郁林其的

参军到参加工作,离乡前的乡下女友一直痴爱着郁林其,但又在现实婚姻的梯度选择中,郁还是娶了城里女人为妻。功利的务实与情感的务虚,这种身心冲突加剧了“农民军人”文化心理的救赎情怀。

当然,在小说的结构编排上,文本设置了郁其林患上了绝症,因而死亡对他来说只是时间问题。应该说,这一情节设置带有阎连科式的“宿命”意味。因为,在死亡的预定中,郁甘心替战友受过,对妻子又隐瞒自己身患癌症的隐情,这使得郁荷载着“孤独英雄”的悲情色彩。在与城里妻子离异后,乡下的前女友李妮子则宽衣以待。当然,这种写作又存有古代文人的心理“观玩”与“意淫”色彩。不过,从“性”的层面上来说,李妮子等候一生的“献身”与郁林其的“拒绝”,使得读者在接受心理上产生了既喜又悲,最终实则是悲的心理斗转效应。对李妮子而言,她倍感等待的荒寒;对郁林其而言,他感到情爱的难以承受之重。然而,这还是小说叙事的表象,因为郁林其对李妮子“性”的回绝,潜藏的则是对“乡村母亲”那片净洁乡土的敬畏与守护。当然,从接受心理学上来说,作者这里使用了文学写作的“虐心之术”,这种“虐心”可谓一石二鸟,一是延续了其小说创作的“悲情”风格,一是激起读者审美心理的悲剧效果。因而,李妮子虽已结婚且有孩娃,但心中爱着的还是她的“林其哥”,这种对恋人“哥”的乡间称谓,潜隐其中的是“情亲+爱情+……”的敦厚与浑茫。如是情感的在场,实难用明晰的逻辑语言加以阐释,相反,只能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文化心理体验。不过,作者这番情节的苦心设置,也有其文化心理的机巧所在,凸显的是乡野女人地母般的宽厚与仁慈。再就作者安排郁的身患绝症而言,内中寓意的是城乡二元文化心理结构的在场,即主人公的进城败退与返身回家。虐心的是,郁的还乡不是功成名就的凯旋,相反,却是孤苦伶仃的返乡后的举目无亲,葬礼也显得颇为凄凉。不过,令郁欣慰的是,他死后能魂归故里。因而,从离乡求生到返乡死亡,郁的文化心理是扎根在乡土故里的。

《大校》中写大校旅长汪洋与乡下妻子赵秋霞的婚姻悲剧。文本中大校的城市妻子虽是缺席的意象,然这一缺席却可以通过乡下妻子赵秋霞的述说可以得知,那就是“她说洋,我不配你,我不识字。我长得不好。我大你三岁。我怕一辈子会拖累你的前程。我想好了,结了婚我一辈子不去部队,不去给你丢脸。我就在家侍奉爹娘,到爹娘下世了,我没事干了,我就和你离婚。或者你在外边有女人了,那样太伤我的心,你就说一声秋霞,咱俩分开吧。说一句我就明白了,我就同意了”^{[6](153)}。这里不厌其烦的引用原文,是为了还原一个弱者对强者的宽宥与悲慈。根植在千年农耕文化传统中,女人持守的大多是“嫁鸡随鸡”的婚姻观念。不过,《大校》中赵秋霞自认自己不配大校,这种婚姻的“不配”源于两者社会地位的差异。当然,大校的心理自责却也无法泅渡到心灵的彼岸。究其因由,那就是当年参军入伍,其进城欲望的实现还是因为娶了赵秋霞而实现的。因而,面对赵秋霞的大义与深情,大校自感人格低沉的茫白与现实婚姻的难以超越之重。在其公爹老死之际,赵秋霞“被不在家”,这源于在乡土世俗观念中,大校与赵秋霞的婚姻显得格格不入,因而“被不在家”为的是避开中国人“要面子”的“颜面值千金”的尴尬。有幸的是,司仪还是让秋霞见了公爹最后一面,应该说,乡间司仪所代表的还是浓浓乡土文化伦理观的在场。作者通过司仪叙事声音的在场,加剧的还是大校救赎心理的无言坚守与难以背负的深情悲恸。

聚焦在公爹的葬礼上,赵秋霞痴痴呆呆地哭着“我公公死了,我以后侍候谁啊?谁还让我侍候啊”这段话,无不令读者扼腕叹息,因为赵秋霞与大校的婚姻,只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然既已嫁大校,那就要尽到媳妇的孝道,这是乡土“孝道”的规约使然。传统女性的赵秋霞不识字,然不识字却不代表她不知礼,也正是在乡土习俗“知礼”的坚守中,她牺牲了自己的一生。这彻底击碎了大校的心灵城堡,它像针尖扎在大校心灵最柔软的地方,使得他只能用无助的手抚慰着无言的痛。因而,作者在夸张却又“神实主义”的叙事中,写葬礼上大校的泪像晶莹的石头一样砸在了静谧的土地上,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大校落泪的咚咚啜啜声。泪水作为具象化的情感符号,寓说的是两者婚姻的悲情与浑茫的苍凉。客观来说,大校从本是农民到不再是农民,赵秋霞是跪着原谅大校的,是在从未反思的命运之旅中接受了命运的不公,因而,如是空间化的传统女性意象设置,体现出了道德臣属与回归的关系,内中存有置根于乡土中国道德地基上的文化安全感、归属感与救赎感。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乡土中国处于农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之中,小说在“重温古典”的“进步的退守”中,体现出了温情、悲情的道德意象回旋,为“唯利是图”、“金钱至上”、“道德滑坡”的现代工商业社会传递出了形象诗学的道德声音,从而在

道德维度上“跪拜”在乡村女性膝前。往深处说,那就是在“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城乡发展失衡中,乡村因其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转而成了精神家园的“避风港”。

三、民工进城:进城之路与返乡之旅

《行色匆忙》中作者在第一人称“死亡视角”叙事中,写耒耜山脉的王襁高中毕业未考取大学,下学后当上了村团支书。作为乡村土地上的觉醒者,他看出了城乡差距的那条历史鸿沟,看出了城乡二元社会生存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差异,因而即便村长答应自己娶了他女儿后答应让襁当上村长,可这在襁看来不过还是芝麻大点的小官,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因而襁成了土地上的“逃离者”。在襁看来,“村长算啥,山外有山,乡长算啥,天外有天。县长算啥,世界无边”。于是,他带着叶子私奔逃离耒耜山脉时歇斯底里喊道:“我日你祖宗八辈,这山梁这村落,老子这辈子再也不要回到你这屁地方。”^{[7](41)}其实,襁的向城求生不过是底层视角的农民工进城的当代书写,是其生存观与价值观的体现。不过,横亘在耒耜山脉与城市之间,作者安排了城里女人红唇与乡下女人叶子两个女人形象。在隐喻性的意象空间对比中,显示出叙事者文化心理根植的乡土深情。城里的女人红唇对于襁来说,不过是襁进城的欲望与野心的符号象征,这使得襁甚至不惜背叛叶子。但是,红唇只是假借情感的外衣,视襁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同样,襁也在潜意识中视红唇为进城求生的手段,两者都有只问结果不计手段的欲望者形象。相对而言,红唇从主动认识襁,到一块看电影,再到“床上”对襁的引诱与“床上最后关口”的“急刹车”,红唇是整场感情戏的导演,襁不过是一步一步沿着她所设下的陷阱走去,最后襁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而,红唇以做生意赚大钱为诱饵,骗走了襁的两万块钱而后不知去向。在此意义上,红唇作为现代蛇蝎女人与背叛者形象赫然生成于小说的文本世界中,内中潜隐的是对城市伦理道德的敌视、恐惧与不信任。

相对于红唇而言,叶子随襁一块逃离耒耜山脉,叶子一直痴心于襁。在小说文本中,襁带着叶子连夜走出了村子。临走前,襁叫叶子回她家拿五十块钱,叶子因为往死里爱着襁,也就偷了家里五十块钱。可以说,叶子为了爱情不惜背叛了亲情。然从乡村逃离到闯入城市,一连九天没有找到活干的襁被逼入了生存绝地。不过,叶子倒是对襁说:“襁哥,明儿咱回家,讨饭回家过日子,做牛做马我都侍奉你。”叶子喊襁为“襁哥”,这种“情亲+爱情”称谓的再度重复出现,传递出了耒耜山脉的痴女形象,这种痴爱已成了当今工商业社会稀缺性的情爱话语。面对叶子的痴爱,襁说:“我经常以为人世上有一种特殊女人,就是越打越骂她越对你好。”^{[7](47)}还认为:“女人真心爱了男人,她便成了人世上最傻的人。叶子就是这么一个样,她把心掏给你,你想把她的心当做下酒菜,她会主动把心切成一丝一片端到酒桌上。没法儿的事,她就这么没骨气。没骨气的女人才是真女人,有骨气的女人其实是个两性人。”^{[7](52)}文本中襁对叶子的痴爱总让人感到是一种“戏谑”之说,其实不然,它是襁内心悲苦的“泪话笑说”,当然,也更显叶子对襁的情爱如山。后来,襁因经济问题“犯事”后,让怀有身孕的叶子先行回到耒耜山脉。然而,作为失败者的返乡,叶子因未婚先孕且又没有正式与襁结婚,叶子遭到了父亲的一顿毒打,还要叶子拿下肚子里的孩子,可是叶子不愿意。后来,警车来到耒耜乡下,因为襁与叶子的“夫妻”关系被警察带走。然叶子却喝了半瓶敌敌畏自杀了,孩子也是胎死腹中。应该说襁是个悲剧人物,他进城首先是为了求生,继而改变生存处境,但进城后却被城里女人红唇骗了;返乡后叶子与腹中胎儿也死了,小说结尾的人财两空写出了农民工“向城求生”的血泪史。在性别载体化空间意象对照中,对城乡社会的道德判断业已分明。襁从进城到返乡,城市成为“他者”的敌意与报复空间。因而,襁“不仅在宾馆门口吐了痰,在广场上撒了一泡尿,完完全全是蹲在大厦的楼顶上朝着那座城市拉了一泡屎”。其实,襁的不雅行为是一度对城市文明向往之后的不屑与愤恨。最终,襁回到了耒耜山脉。然返乡后,他面对的却是叶子的坟墓,返乡的希望成了无望的绝望。特别是小说的结尾,作者在灵异思维的魔幻叙事中,打破了生死界限的藩篱,写了活着的襁与死去的叶子的一场生死对话。叶子说襁“你回来了”,襁说“回来了”。襁问叶子“你那边怎么样”,叶子说“青山水秀,吃穿不愁”。于是“襁就去了叶子那边的世界”。小说结尾化用了中国古典小说“化蝶”结局,寓意的是襁对空间化的耒耜山脉与叶子情感的双重归依。

四、知青下乡：城乡游走与扎根乡间

当代文学史上的知青小说不胜枚举。然而,阎连科的《最后一名女知青》却在故事结构的跌宕腾挪中,完成了知青“下乡—返城—下乡”的文化心理幽暗与皈依的书写。^[8]体现在小说人物设置的转变上,小说主人公由女性变成了男性。一个是城籍女知青娅梅,一个是乡下民办教师张天元。交错于两者之间,就是城籍知青郝狐狸与城里商人唐豹。不过,小说叙事表象的变化或曰创新,这里的性别转化其实只是一则障眼法,其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却是同一的。因为张天元与唐豹不过是空间化的两张人物精神面影。就下放知青郝狐狸而言,他费尽心机想返城,屠杀耕牛是对自己下放命运的心里泄愤,内中原因是“逃离土地”成为其难以克制的怒火。其实,就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而言,“上”与“下”是文化身份与社会地位高低的本土化体现,“下”与“上”相比,有一种被城市放逐的失落感,继而“知青返城”之“上”才是文化身份的本位表达。再则,“最后”一名女知青,“最后”一词显得颇为悲情。然而,何谓“最后”,这不是实证的数据分析,定语修辞凸显的是悲情的加剧。娅梅作为乡村“外来者”,她不是乡土的“本家”,她在“外来—返城—返乡”生存空间迁徙中,从返城后的事业有成到失败,再到城市婚姻的破裂与“胎死腹中”,城市只是娅梅的伤心失落之地。城里丈夫的阴险歹毒、骗取钱财与寡情薄意等,使得娅梅眼中的城市是一张由钱、权、色织成的灰暗之网。相反,在空间化人物意象对比中,张天元在“退却式”的悲鸣与同情中,对娅梅的扎根乡下还是重返城里,他都有着同情的理解,这使得两者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有着文化心理的裂隙与文化身份的差异,因为“城市人终归要回到城市”。

与同类知青小说比较,《最后一名女知青》的“最后”,无非是城籍知青的彻底扎根乡下。然而,这种“彻底”源自她城市境遇“彻底失败”,她从“上山下乡”的命运无法抉择再到自主扎根于乡下,当年的“诅咒之地”却成了其精神故园的所在。细想起来,《最后一名女知青》在同类知青小说中的技高一筹之处,在于其叙事模式走出了以往知青返城后对“第二故乡”伤痕式、救赎式、乡愁式的诗意书写。相反,小说结尾看似写到了娅梅与张天元“大团圆”的结局,却又安排了张天元的乡土逃离,两者“破镜难圆”。在张天元看来,娅梅扎根乡土不过是“脱开都市,到这旧地寻找一丝安宁”。因而,“一走一来”,暗喻着他们现实婚姻的难以结合。当然,张天元与刘城女人的“绯闻”与“床第之欢”,并不是他与娅梅难续姻缘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小说情节的一则“小插曲”。因为,就张的出走而言,谁又能保证他不再返乡,况且小说结尾对张的进城书写又显得那么急促与草率,因而张的出走“可信性”显得颇为稀薄与绵软。该离开的却又重返乡下,不该离开的却又离开了,结尾的反常所形成的思想张力,使得娅梅的乡土梦寻与家园归依显得颇为“另类”,但却坚实再现了叙事者乡土文化寻根与家园梦寻的文化心理在场。

五、小 结

在阎连科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很难看到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文化因子,也很难用女权主义理论去加以阐释。在其文化心理积淀中,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还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套文化习俗的存在,女性并没有“冲破男权的牢笼”。相反,乡间女性往往失去的是个体的存在。缺失的是“女人不是月亮”那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在乡土文化的反顾与坚守中,作者刻画出了乡土地母的精神面影,但却又落入了男权中心主义的在场。然而,这与其说是刻意的重构倒不如说是习以为常,因为,在其小说的文本世界中,流动的只是小说情节的变幻莫测,不变的则是乡土文化心理河床的厚实与坚固。但是,男权中心主义也是遭人诟病的地方,因为内中存有“男尊女卑”的文化思想。不过,这又不能简单地用“启蒙论”的文化视角去加以批判,因为,在城乡文化空间的并置与文化时差的心理错位中,作者文化心理的罅隙就体现在乡土伦理观的现代征召与凝神观照中,继而写出了乡土社会乡间女性的悲慈与宽厚。除此之外,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文化对比中,再现的也是乡土中国“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特质的历史绵延。

世界银行曾撰文指出:“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村、

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9](1)}从整体性上说,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两个转变”其实是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生发的是农耕文化与工商业文化的冲突。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最重,确为中国的事实。”^{[10](17)}聚焦在阎连科的小说文本中,负载于“城市”与“乡村”女性意象的文化空间构型上,“城市”成为乡土文化的他者,“乡村”成为道德话语的本源,这种空间化文化心理的对峙与偏仄,就其创作心理学上而言,这源于作者“农裔作家”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的始源,作者坦言自己“离开乡土是无法写小说的”^[11]。在问及“有没有可能写城市题材的作品”时,他的回答是“恐怕写不好”,原因是“父母把你生在某块土地上,就注定你的作品所表述的一切都不能逃离出这块土地。离开不仅仅是一种疏远,还可能是一种失败”。^{[12](125)}醉卧于浑茫厚重、艰涩苍凉的乡土世界中,作者在城乡双向视域的文化考量中,离乡与返乡的矛盾,往往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演绎在道德问题上,使得乡土世界成了道德制高点,继而成了城市批判的话语源泉。不过,从城市的道德批判到乡间的乡土诗意,乡村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而是美学无功利的乡土梦寻。

参 考 文 献

- [1] 阎连科. 我的现实我的主义[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2] [美]J. 希利斯·米勒. 小说与重复[M].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 [3] 阎连科. 风雅颂[Z].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4] 阎连科. 母亲是条河[Z].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6.
- [5] 阎连科. 和平战//中士还乡[Z].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
- [6] 阎连科. 大校//桃园春醒[Z].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
- [7] 阎连科. 行色匆忙[J]. 小说家, 1994, (5).
- [8] 阎连科. 最后一名女知青[Z].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 [9] 《2020年的中国》编作组. 2020年的中国[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 [10]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学林出版社, 1987.
- [11] 张英, 伍静. 阎连科: 拒绝“进城”[N]. 南方周末, 2004-04-08.
- [12] 阎连科. 机巧与魂灵: 阎连科读书笔记[M]. 花城出版社, 2008.

Fleeing and Returning ——on Yan Lianke's Space Structure and Local Dream Seeking

Xu Xin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rt and Media,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Anhui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In Yan Lianke's rural narrative, city and countryside respectively represents the origin of moral discourse and “the other” of local culture which loads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through two different kinds of female image, this topic reflected by way of four series stories though intellectuals born in rural, peasant soldiers,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educated youth.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ociety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narrator often attributes social issues and political issues to moral dimension, then formed a struggle of discourse originates in rural culture and urban culture which embodied in narrator's cultural psychology rooted in ethical concept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s.

Keywords: fleeing; returning; spatial structure; female image; spiritual homeland